



書評

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Vol.12 (2) 2019

再思中共革命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评聂莉莉《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新中国初期的潘光旦、费孝通及其周围》—

张放¹

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一直是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和重要议题。2015年，东京女子大学聂莉莉教授出版了《知識分子の思想の転換——建国初期の潘光旦、费孝通とその周围》²一书（后称《思想转换》），丰富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的观察视角，深化了该领域的研究。2018年该书的中文版由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刊行，³这势必引起华语学界对该问题的进一步追问与反思。关于该书的结构逻辑与各章节主要内容，武藏大学的西泽治彦教授在其书评中已有详细介绍，⁴此处不再赘述。本文旨在关注该书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并经由此书再次进入那段历史岁月，探讨知识分子与中共革命之间的关系，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些思绪片段。

探索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对于全面纵深理解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来说至关重要。中共革命极大程度地重新塑造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资源的汲取与流转过程、政治制度的运作方式、人际关系、思想观念甚至中国人深层的精神气质。概言之，中共革命同时颠覆了现代中国的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事实上，关心中国革命的研究者从一开始便注意到中共革命之影响所具有的内外两个维度。关于革命之于社会结构等影响的研究，随着不同种类史料的挖掘与整理，以及研究手段和观念的更新

升级，经过数十年的积累，取得的进展已相当可观。与之相对，在对革命之于精神世界之塑造的研究中，随着有革命经历和被改造经历者的逐渐逝去，历史场景的疏离感日益增长，我们对该问题的把握难度正慢慢加大。即便还有些经历者健在且我们有机会接触，随着时光流逝，他们对过往的记忆也会发生扭曲、错位、选择性遗忘和淡化等现象，这无疑为后来者的实证研究制造了诸多困难。于是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于中共革命与中国人思想观念和内部精神世界塑造之关系的研究，始终没有取得公认的突破性进展。对该维度的研究，有待持续加强。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无疑是该维度诸多问题中的重点。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吸收了西方现代文化，呈现出了一种“思想文化融合”的状态。因此，对于这一群体思想改造问题的研究，其实为我们后来者提供了一个契机，以观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逻辑和话语究竟是以何种方式与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现代思想之间发生碰撞，并最终获得统摄性地位的。而对这样一个过程的全面把握，则是我们进一步深入党性、理性、人性共同交织的意义之网中，理解“革命中国”精神维度塑造内在机理的基础。因此，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的研究，对于理解中国革命的

内在维度之意义非常关键。鉴于这一重要性，很难说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只能引起“专业小众”的兴趣。事实上，随着高等教育在中国的推广和普及，越来越多的非专业研究者也开始对新中国初期的知识分子之命运予以关注，这种关注不仅仅来自于对历史的纯粹好奇，更源自于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未来之走向的探索与拷问。概言之，在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不仅是一个专业领域内的大问题，也是一个能够引起广泛共鸣的具有时代感的真问题。可以说，《思想转换》一书的出版，恰逢其时。

在讨论《思想转换》一书的学术贡献之前，我们有必要提纲挈领地对现有研究做出回顾。虽如前所述，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研究中具有广泛说服力的突破性成果非常有限，但作为中国研究领域的一个经典话题，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积累下了数量众多的成果。这些成果，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初期的处境问题打下了学术基础。不过宏观地看，现有研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

首先一个问题便是先前很多研究倾向于将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进行简单化、情绪化的处理。中国大陆的传统研究，往往从“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的大逻辑入手，将1950年代初期的知识分子描绘成虽有羁绊与苦恼，但却积极配合新政权完成思想改造之重任，终获思想上的重生。这种研究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蜜月-配合路径”。而与之相对，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传统，往往采取一种相反的预设，他们将毛泽东所创立的体制视为一种具有完全压倒性优势的统摄性“怪物”，它可以轻松吞噬知识分子的肉体 and 灵魂。知识分子面对如此凶恶猛兽，既没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只能束手就擒，放下自己的固有思想，服膺于新政权的逻辑和话语，并为之付出各种代价。我们可以抽象地将这种研究归入“极权主义-全面压迫路径”。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曾经处于弱势地位的知识分子重新获得话语权，在大陆

一种“受害者视角下的控诉路径”也随之而来。这种路径对大陆的知识分子改造传统叙事进行了颠覆性改造，其逻辑底色与西方的研究传统更为接近。而杨奎松教授的《忍不住的“关怀”》⁵可以说是大陆学术界内部对上述种种研究路径的一种批判性回应，该书试图用更加丰富的史料呈现更为立体、复杂、多元的历史过程，摒弃之前过于简单化、公式化的处理方式，有助于读者对相关问题的学术性理解。

另外一个问题则在于，先前的研究者在论及“知识分子”时，很少论及“知识分子”其实并非铁板一块的整体，或者说多数研究者的潜意识中并不认为知识分子的类型与知识分子的改造之间存在着可供深入分析的关联。事实上，知识分子成长的家庭环境、专业特长、学术训练轨迹、从业经历与人际关系圈都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在思想改造中的种种抉择。且不说从事自然科学的科学家和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读书人之间因为专业分野而造就的不同命运——关于前者，近些年大陆学界开始给予关注，围绕这个群体的相关研究以及口述史等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已展开。⁶仅就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读书人或“文人”而言，家庭环境、成长环境和人际关系网络暂且不提，单专业背景来说就可能为他们的思想改造前途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例如，这些知识分子中有人从事纯粹书斋里的学问，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深邃的思辨来从事研究；而有人则对1949年之前的中国城市或者农村非常熟悉，他们是通过不断与社会接触来完成研究工作的。“理论型”的文人和“实践型”的文人，思维方式和学术体验方式颇有不同之处，他们在面对全新的意识形态逻辑和话语时，恐怕也会有不一样的心态，由此呈现出命运之歧途。

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反思和回应，在《思想转变》一书中都所有呈现。作者首先注意到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历史的复杂性，坦言要“尽量避免简单地做出价值判断，而是要致力于接近

复杂生动的历史现场，从各种相互交错的具体‘事实’中，探索知识分子集体思想转向的脉络，把握那个时代的政治动向以及思想结构的特征，以期在这个层次上进行历史反思”（15页）。作者对这种“复杂生动的历史现场”的描绘，首先基于对史料的处理工作。在处理史料方面，作者借助了日本历史学者迟塚忠躬的提法，通过五个步骤利用史料来呈现复杂过往：1. 设定问题，2. 选择史料，3. 批判、甄别、解释史料，4. 把握事实之间的关联性，5. 建筑历史图景。作者虽然以接受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训练为主，但通过她选择的处理史料的方法来看，还是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历史学“厚读”史料的核心理念。作者使用的史料也是相当多元——研究对象的年谱、传记、文集、日记、回忆录、自我批判文章，研究时段的报纸、杂志、文件资料汇编等。不过，如果从历史学的角度看，资料还可以更丰富一些。此处仅举一例，在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市级档案馆中，收藏了很多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文书档案，记录了多次学习与批判会议的现场状况，许多有名望的知识分子的发言都被记录其中。通过这些材料，能够更完整地还原思想改造的历史场景，并进一步体会知识分子在当时所处的舆论环境。不过瑕不掩瑜，作者目前所使用的材料以足够撑起其研究框架。

既然对史料有意识地做出了复杂化处理，那么相应的，作者的分析亦力图呈现出四个层次：第一是对知识分子本身的行为过程进行梳理；第二是从宏观政治局势和微观个人选择两个层面理解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第三是力图呈现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轨迹与知识生产环境的改变，并揭示其背后的动力；第四是将知识分子的思想认知与社会现实之间做出对比。如此一来，在作者笔下，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就不仅仅是国家之于个人的单向施加过程，而是知识分子在变动不居的具体生存环境之中与国家意识形态和制度力量的双向互动，这种互动

由积极响应、消极逃避、巧妙周旋、被动接受、绝地反抗等多种行动取向共同构成。作者的这一分析视角可能更加接近于历史现场——知识分子既不是铁板一块的理想主义共同体，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不食人间烟火的精神存在。他们存在于鲜活的场景之中，既有爱恨情仇、又有恐惧疑虑；他们有人雄心勃勃，想大干一场，实现自己的抱负；有人畏手畏脚，只想躲进书斋，不问政事。作者所强调的研究方法，可以不断提醒读者，要时刻警惕将“知识分子”贴上统一标签的冲动。

除了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历史进程进行多元化、复杂化的处理之外，《思想转变》一书最大的一个特点便是将研究焦点对准了具有社会学专业背景的知识分子。社会学专业并非诞生于中国传统的知识结构之中，而是源自现代西方的舶来品。现代中国负笈海外的留学生回国以后创建了社会学专业，并逐步开拓了社会调查的中国传统。加之一战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列强的侵略行径进行了激烈反思，逐渐将关注点从国家层面转向了社会层面，经由现代国家救赎民族的诉求开始向重建社会救赎民族的诉求过渡。可以说，“重新发现社会”背后交织着政治诉求与知识诉求的双重冲动。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大学社会学系的师生一起从事了大量社会调查，留下了诸多鲜活的社会调查材料——以王笛去年出版的《袍哥》⁷一书为例，该书的基础史料全部来自于一名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对四川某地的调查，而该调查报告则是作为该生的本科毕业论文提交。由此管中窥豹，就能察觉到当年社会学系对于实地考察调研的重视程度。

我们可以将具有社会学专业背景的知识分子之特点概括如下：他们成长于面临着政治体制、社会结构以及价值观念等多个层面崩塌与重建的“转型中国”⁸，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某些特质，又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教育。与此同时，和做纯粹书斋式学问的知识分子相比，

他们对于中国现实有更多的了解。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改造，其话语逻辑恰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现实进行阶级分析的基础之上。对这类知识分子进行考察，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即感知当他们自己建构中国现实的逻辑与新政权建构中国现实的逻辑发生碰撞之时，会产生什么样的曲折与纠结。作者1980年代在北京大学攻读社会学硕士学位时，师从费孝通先生，后又在东京大学取得人类学与比较文化方向的博士学位。可以说，她的专业训练背景以及对目标研究人物的熟悉，都为其深入透视这一知识分子群体提供了必要的储备。由一个专业人士来讲述专业内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中的心路历程，更能有效地规避先前研究往往容易陷入泛泛而谈或空发议论的尴尬，进而可以帮助读者深入理解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专业背景在他们接受思想改造的过程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到底是成为他们顺利进行思想改造的羁绊与历史负担，还是成为促使他们拥护新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的助推器，抑或发挥着更为复杂、充满张力的作用。

作者为了研究清楚这一问题，特意将几位知识分子在民国时期从事农村调查时研究农村结构的学术观点与他们在新中国之后对农村结构问题的发言做了对比，这样一种比较视角是之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研究中很少出现的——先前的研究更倾向于对改造中的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进行描绘，但却由此忽略了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其思想层面所具有的连贯性与断裂性问题。如此一来，那些研究虽然对改造中的知识分子着墨颇多，但读者却始终无法明了知识分子的“知识”在此过程中到底如何参与了观念的重新建构。那些研究事实上成为了没有“知识”在场的知识分子改造研究。而聂老师将“知识”引入本就该存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现场之后，我们发现这一传统话题的研究空间被大大拓展了，涌现出了诸多新的可能性。

通过作者的对比，或许读者会惊异于几位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其观点改变之巨。他们对农村的社会结构、农村地主之现状和作用等诸问题的看法产生了颠覆式转变。那么，如何解释这些变化？它们源自于知识分子在重新进入农村土改现场后，知识层面自觉发生的反省与批判？还是知识分子为了融入新政权、迎合新政权以实现自己的抱负而做出的策略性调整？还是在上级和同辈社交圈甚至是家人和学生的共同压力下而被迫做出的让步与表态？作者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线索。在对潘光旦先生的个案研究中，作者坦言对于潘先生思想转化的具体原因，“我们暂时还找不到答案”（258页）。因此只能从外部观察者的视角给予一般性解释：“（思想）先后矛盾之现象，当然也绝不不仅是个人思想缺乏一贯性、连续性的问题，而是在革命思想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发生了背离、断裂的问题。通过这种对比，亦可以理清一些相关的革命思想的特征。”（258页）确实，在文本与文本之间，呈现在研究者面前的只有文字之差异。通过叙述对比，研究者可以探寻革命话语是如何与知识分子的原有话语发生融合的，并以此为基础总结“革命思想的特征”。不过，如何把握支撑这种转变背后的思虑过程却颇为棘手。

作者出现的这种困惑，笔者也感同身受。如何理解这种未被言表的内在动力？这些年笔者对该问题的思索也在发生变化。以前在读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这段历史时，笔者常常为这些知识分子的遭遇扼腕叹息，唏嘘不已。当时，笔者倾向于将知识分子的改造史单向度地理解为新政权对知识分子的规训史，而这些知识分子都是生活在书斋中的纯粹精神追求者，一心向学，并无什么政治抱负。笔者常常为这些知识分子打抱不平，政权为什么就不能让他们安安静静地躲进象牙塔做自己的事情？后来读到了马克·里拉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⁹，他通过六个案例分析，向我们揭示出一些精英知识

分子身上所具有的那种抑制不住地将自己的思想借助权力普遍化的冲动。那时笔者逐渐意识到，知识分子并非生活在绝对的真空和自己建构的精神世界之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除了常人的七情六欲之外，还有更高层面的理想和抱负。如若想要实现这些理想和抱负，他们就不得不与政治权力之间发生关系。事实上，像潘光旦、冯友兰等人，他们在国民政府期间也都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与国民政府有着接触。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级知识分子，到底持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这恐怕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想法未必一样。比如《思想转变》中提到的沈从文，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将自己的生命体验注入文学这一外在表达形式之中，以此来呈现自己与世界之关系的书斋型学者，他缺少行动的热情，也不具有直接改变社会的冲动。比起费孝通、潘光旦等人，沈从文的内向型特点非常鲜明，因此他面对咄咄逼人的新政权，从内心爆发发出了一种恐惧感。但是，很多高级知识分子还是存有改变社会的内在愿望，他们也习惯于处在“指导位置”的某种隐形的优越感——与底层的小知识分子相比，他们显然不如小知识分子对生存环境变化的判断敏锐，当他们还留恋于那种虚幻的优越感之时，小知识分子早就开始了自发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¹⁰笔者在阅读北京市档案馆的档案时发现，甚至是在开始接受思想改造之后，这些大学里的高级知识分子依然放不下架子，仍不愿意像小知识分子那样按部就班地学习社会发展史和中共党史，而更愿意学习抽象的、形而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以及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¹¹

以这样一种心态迎接新政权的高级知识分子，其实是没有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以应对未知的变化。在新政权成立初期，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更在意的毋宁说是自己在新政权中的位置。

以潘光旦为例，1949年中共进城之后，邀请教授到北京饭店吃饭没有请他，新政协会议也未邀请他参加。¹²这使得潘光旦在这段时间颇为消极沮丧，这种情绪自然也流露在他的日记当中。在《思想转换》中所列举的流露出低落排斥情绪的日记条目主要集中在这一阶段。1949年10月，潘光旦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后，逐渐积极起来。这样一段“小插曲”，或许可以为潘光旦的思想转变提供一个解释视角——潘光旦那段的消极，未必完全如《思想转换》所言，是其基于对“民主社会”和“个人”的学理认识而做出的智识抉择。当然，笔者并没有暗示说这一视角可以对其转变进行全面解释，只是想说研究知识分子，无法回避其与政治之间若隐若现的关系，如果在理解知识分子的选择时，未去考虑选择背后政治层面可能存在的动机，这种理解就会有失偏颇。

如果考虑到潘光旦在政治层面所具有的诉求——这种诉求未必是要在新政权中争取什么实权，或许就是为了维护或巩固自己在新体制中象征意义的“指导位置”——那么再去理解他在土改中的变化，可能就不会觉得那么突兀。土改中使用的阶级分析方法源自于毛泽东革命早期的农村调查实践，并贯穿于中共的根据地革命实践。对于中共来说，阶级分析的方法实际上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思维与中国农村的现状对接起来，让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从“空谈”落地，进而寻找到异域概念与思维在中国的表达方式与实践方式。对农村进行的阶级分析，首先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构了基层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政治秩序，其次又为策略性的革命动员奠定了基础，最后还回应了党内的路线分歧，以阶级实践的方式化解了理论上的不同意见。在农村发现阶级斗争，用一位学者的话说就是“实质上构成了应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产生的总体性危机的一种独特回应”。¹³

用阶级理论重构农村社会,对于中共来讲,与其说是一种学术见解,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实践,一种经历了血雨腥风的残酷革命考验的政治经验和智慧。因此,知识分子在面对土改发表意见的时候,其实不是用一种学术观念取代另一种学术观念,而是一种政治表态,或者说通过表态,递交上一份“投名状”,以换取在新体制内的暂时性安全。明白这个道理的诸如费孝通、潘光旦等人,都先后对土改采取了的颂扬态度;而不明白这个道理的诸如董时进,竟以上书的激烈形式对其进行批判,幸好及时选择出境,否则今后的命运实在不容乐观。不过,中共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族的独立,都增加了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的土改的说服力。以梁漱溟先生为例,1949年之前坚称中国社会并非一个“阶级分化”社会的他,在其深厚的比较思想史功底基础之上,开辟了一条乡村建设之路。不过,当他参观完土改归来之后,有感于中共竟然在农村制造出“阶级”,以至于修正了以前的一些想法,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的建设之路。¹⁴因此,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与认识中共土改之间关系紧密,《思想转换》一书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个问题,比之前研究更为集中地围绕两者关系展开讨论。

《思想转换》在结论中讲到,这些知识分子无论如何也始终无法融入到中共主导的新体制之中,一直存在着一种游走于边缘的疏离感,再也进入不了体制的中心,重建原属于他们的荣誉感和优越感。事实上,不仅仅是这些在1949年之前与中共保持着距离的知识分子,就算是成长于根据地的中共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也是小心谨慎、如履薄冰——齐慕实对邓拓的研究,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揭示体制内文人精神世界的个案。¹这样一个革命中诞生的新政权,始终对知识分子保持高度的戒备与警惕,这恐怕也很难单说就是共产主义体制本身的弊端——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思考,将有助于我们直击光环阴影下的制度问题。为了进一步深

化对该问题的研究,一方面,我们需要加强对比研究,观察苏联等共产主义阵营国家的知识分子境遇,以明晰共产主义文明中思想控制的不同模式;另一方面,恐怕需要沿着思想史的脉络,对中国传统中源自底层的潜在“反智传统”进行梳理。唯有将比较研究与思想史透视相结合,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思想改造背后的内在动力,并由此反观我们的命运。时光荏苒,距离知识分子改造已经过去60余年。在今天的语境下,当读起来聂老师的这本书时,除了感受到历史的冲击以及作者笔端流露出来的温暖之外,这段阅读体验也在为即将要面对、又不得不面对的高度不确定的未来完成必要的心理建设。

注释*

- ¹ 上海外国语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
- ² 聂莉莉『知識分子の思想轉換—建国初期の潘光旦、費孝通とその周囲』風響社, 2015。
- ³ 聂莉莉著, 聂晓华译:《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新中国初期的潘光旦、费孝通及其周围》, 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年。本文涉及聂著的引文, 均来自于该中文版。
- ⁴ 西澤治彦「知識人の思想的轉換を通して見る中国革命の光と影」『東方』433号, 2017年3月。
- ⁵ 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 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
- ⁶ 例如参见熊卫民:《对于历史, 科学家有话说:20世纪中国科学界的人与事》, 东方出版社, 2017年。
- ⁷ 王笛:《袍哥: 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
- ⁸ 关于“转型中国”的相关论述, 可参见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 新星出版社, 2010年, 第134-152页。

- ⁹ Mark Lilla. *The Reckless Mind: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s*. New York Review Books. 2001.
- ¹⁰ 张放：《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小学教师的思想学习与改造（1949-1952）》，《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年第3期，第48页。
- ¹¹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会议记录》（1953年12月4日），北京市档案馆，档案号1-22-113。
- ¹² 杨奎松：《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潘光旦——潘光旦“历史问题”的由来及其后果》，《史林》2007年第6期，第2页。
- ¹³ 孟庆延：《理念、策略与实践：毛泽东早期农村调查的历史社会学考察》，《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4期，第25页。
- ¹⁴ [美]艾恺著、黄宗昱等译：《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28-329页。
- ¹⁵ Timothy Cheek. *Propaganda and Culture in Mao's China: Deng Tuo and the Intelligent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